

在海南省博物馆二楼西侧的“木中皇后——海南黄花梨陈列”展厅内,各类雕饰精美、线条流畅的琼作黄花梨家具集中呈现。而在海南农村地区,一些简约实用的木桌、竹椅也时常进入我们的视线。历史上,海南家具的形制同样有官民之分,既有名贵直达宫廷的黄花梨家具,也有在民间较为流行的藤编或竹制家具。

家具是生活实践的产物,折射出一个地区的自然环境和人文风俗。千百年来,生活在海南岛上的人们创造出了许多颇具特色的家具,形成了独特的家具文化。

# 雅俗共赏贯古今 琼作家具：

兼容并蓄出新意

文海南日报记者 梁君芳



海南黄花梨叠枕。

“我们在海南看到流传下来的老家具,大致有两类,一是制作于明清时期带有广式风格的家具,二是海南本土的琼作家具。”海南黄花梨研究会副会长周凤姣介绍,前者包括常见的太师椅、八仙桌等,多采用手工雕刻,使用榫卯结构,用材多为黄花梨、酸枝等。这类家具富有观赏性,能体现出家族气势,多为应对重大节日而制,其中有不少是嫁妆。过去海南的大户人家也会专门请广州有名的老师傅来琼制作家具。

历史上的海南本土家具,多为折叠椅、躺椅、圆桌、凳子等,这类家具几乎无固定制式,主要为满足生活需求而制,用料大都为农村地区常见木材,常见于各地农场。

周凤姣介绍,海南民间家具的流传有一个特点,那便是祠堂、庙堂内的供案、供桌保存较为完整。“普通供案一般高1米至1.2米,但我在海南见过一个高1.5米的供案。供案越高,往往房屋也越高大,反映出屋主的实力和眼界。加之该案虽呈现出中式家具的风格,但绘有西洋图案,我们推测屋主是华侨。”周凤姣说。

受益于独特的自然环境,海南竹藤类资源较为丰富,农村房前屋后或山林里,竹子、藤蔓的身影时常可见。就地取材是人们朴素的生活智慧,于是,历史上竹篾器具和藤编器具在海南岛上广为流行,竹筐、竹席、竹椅、藤篓等是老百姓常用的简易家具。

明正德《琼台志》“土产”一卷中记载,当时海南产出盘、盂、箱、桌等藤器。清代《南越笔记》中也有记述:“琼州出红藤罩,其色殷红,莹而不垢。《志》称粤东多藤,产于海南者为最。琼州有赤、黄、白、青诸藤,又有苦藤、圭藤、土藤,皆堪为器用。”

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文化的融合,海南家具的形态不断变化丰富。海南早期的家具工匠来自天南地北,各个家具制作流派的工艺融汇在一起,形成了具有海南特色的家具特征。进入明清时期,海南的匠人积极学习吸收各地的家具制作技艺,各类家具既有京作家具的气派豪华,也有苏作家具的格调细腻,还有广作家具的庄重大方。

黎族传统独木家具

海南有着丰富的森林资源,木料是黎族人制作家具最易得的材料。黎族人制作木器有较为悠久的历史,过去大多数黎族男性都掌握有一定的家具制作技术,可制作一些简单的木器,包括板凳、桌子、木盆等简易家具。

“独木”是黎族木器最突出的特点,无论器形大与小、结构复杂或简单,功能单一还是多样,黎族人都尽量用一块整木造物。在黎族人的生产、生活、宗教等主要活动中都可以见到独木器具的身影,种类达200余种,包括独木饮食器、独木蒸酒器、独木谷桶、独木舂米臼、独木牛铃、独木凳等。

过去,黎族人居住的船形屋空间狭小,无法摆放太多的家具,而且使用的家具种类也较少。独木凳是黎族最有特色的常用家具之一,由黎族人根据木料原来的形状加工而成,给人以返璞归真之感。20世纪60年代以前,独木凳曾作为乐乐黎族女孩的嫁妆。

独木凳一般用高25厘米到40厘米、直径20厘米到30厘米的原木雕凿。黎族人将一块木料的中部掏空,同时留下多条起支撑作用的凳腿,凳腿弯曲呈弧形,美观大方又实用。有一些独木凳的凳面和边沿上还刻有黎族特有的花纹图案。如此费工夫,其实一条独木凳的制作成本不亚于由板材拼接而成的凳子。

海南黎族聚居区大部分位于中部山区,这些地方植被覆盖率高,但空气也较为潮湿。为了避免潮湿的空气给器物、储存的粮食、衣服等带来霉变,黎族人通常使用藤条或竹条编制家具用于收纳物品。例如,以前许多黎族家庭没有衣柜,黎族人就用藤条编制藤篓,用来装衣服。



海南黄花梨婴儿车。

桌椅板凳、床柜架格,细细算来,我们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与家具的亲密接触中度过的。古往今来,家具深入参与了我们的生活起居,影响了中国的礼仪文化、人文风貌。以至于当我们翻开一本字典,会发现许多汉语词汇与家具渊源颇深。

## 词话家具

文海南日报记者 罗安明



海南黄花梨书画箱。

大约五六千年前,我们的祖先从游牧状态进入农耕时代,开始穴居生活。洞穴内空气潮湿、地面泥泞,为了生活得尽可能舒适,他们用草、树叶、芦苇等编成席子,席地而坐。

久坐身体总会疲惫,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,几、榻、床等低矮家具出现,为人的身体提供了新的依凭。榻,本有“塌然接地”之义,其重心离地面较近,方便坐在上面的人起身,也能避免地面潮湿之气对人体的侵害。

秦汉时期,古人起居生活的中心开始从席转移至榻上,榻成为文人雅士招待宾客、聚会娱乐的重要平台。现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的古画《北齐校书图》,呈现了北齐天保七年(556年)几位士大夫随皇帝帝勒校五经的场景,一张榻上坐着四人,吃的、喝的、玩的都在榻上,有人展卷沉思,有人执笔书写,有人意欲离席,人物神情生动。

榻的体型比床小,方便移动。《后汉书》记有言:“特设一榻,去而悬之”,古人会将榻悬挂于客厅墙上,以备待客之用。唐代才子王勃的名篇《滕王阁序》提及的“徐孺下陈蕃之榻”的典故,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人的用榻习惯。

据《世说新语》等资料载,东汉名臣陈仲举(陈蕃)因谏言得罪权贵,被贬为豫章(今江西南昌)太守,他刚赴任,就打听当地高洁之士徐孺子(徐稚)的住处,想去拜访。下属随从建议他先去官署,陈蕃反问道:“周武王刚刚战胜殷,就连忙到商容居住的里巷去表彰他。我拜访贤人,不按例先进官署,有什么不可以吗?”后来,陈蕃多次邀请徐稚到府上做客,取下挂在墙上的榻招待徐稚。徐稚离去后,他又命人把榻挂起来,意思是除了徐稚,别人没有资格用这张榻。

陈蕃为徐稚下榻,体现了他礼贤下士的姿态和对宾客的尊崇。后来,人们用“下榻”一词形容宾客入住,其中也有礼遇尊崇之意。



海南黎族群众编的藤篮。

昌江黎族自治县七叉镇大仍村村民米丽珍在展示自编的藤篮。  
海南日报记者 陈元才 摄

## 第一把交椅

相较于几、榻、床,椅是中国古典家具中的“小字辈”。我国最早关于椅子的形象出现在敦煌285窟西魏壁画中,不少学者认为,椅子源自从西域传入中国的胡床(马扎),其在中国的普及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流行有关。

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《诗经》中出现了最早关于“椅”字的记载:“其桐其椅,其实离离。”不过此处的“椅”指的不是家具,而是一种树——楸。楸是紫葳科梓属的一个树种,为我国特有优质用材树,在古文中常与梧桐、漆树等名木同时出现。

自古以来,中国人头脑中关于椅子的概念很清晰:能倚靠的坐具。文献中关于家具“椅子”的记载最早出现于唐代中晚期,宋代以前,“椅子”这一写法反而比较常见。

进入宋代,桌、椅等高型家具开始盛行,人们告别席地而坐的起居方式,垂足而立成为主流。这一时期,椅子的样式十分丰富,其中交椅最为流行,是达官显贵府中不可缺少的家具。

顾名思义,交椅是一种椅腿交叉的椅子,人们很容易从外形上发现它与马扎的相似之处,一般陈设于厅堂供主人和贵宾使用,装饰雕刻较为讲究,有的还配有椅披、皮毛,较为奢华。

广受欢迎的圈背交椅,有软屉、靠背、圈形扶手、踏板,坐起来较舒适,而且方便携带。宋元明时期,皇室成员和大户人家外出巡游、狩猎,经常带着这种椅子。在宋人绘的《春游晚归图》中,可看到一名男子肩上扛着一把圈背交椅。

皇室成员在户外巡游也好,文人士大夫在家中会客也罢,一群人会面,最舒服最奢华的那把椅子肯定要让现场最尊贵的人坐。久而久之,交椅成为权势地位的象征。现在,我们常在各种社交场合听到“某某坐稳了头把交椅”,大致意思为某某在某个领域或某一组织中起主导作用、说了算。

从席上的曲腿而坐,到榻上的相谈甚欢,再到交椅上的正襟危坐,家具塑造了我们的生活形态,丰富了我们的文化记忆。当我们在历史的长廊里驻足回望,它们仿佛是一群会说话的老朋友。